

英 国^{*}

当历史的年轮转向 2018 年时，我们发现带给现代世界巨大震撼和改变的马克思已然诞辰 200 周年，世界各地信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 2017 年以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出版 150 周年之后，又在 2018 年再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千年思想家”，重温他一生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对世界的意义。而在马克思曾经长期生活、工作、战斗过的英国，相比世界其他地方而言，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专著的出版热潮、论文发表的数量和会议的频繁性都空前高涨。不过，与一般性的纪念与铭记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纪念往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以使马克思的精神、方法和遗产真正与我们同行，为持续探索更好的世界之可能性的人们提供思想的指引和前行的航标。下面将从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资本论》再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分歧与统一：种族、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国家主权与激进政治等方面展开介绍。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及英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批判研究”（17YJC710056）成果。

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一）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各种马克思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其中一本比较重要的著作便是由里德曼（Sven-Eric Liedman）撰写的《赢得世界：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①一书，该书的主体部分虽然写于 2017 年，但在翻译成英语之际，作者又增加了很多的内容，而且该书一出版就受到麦克莱伦等学者的关注。如果说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历史学教授、剑桥大学历史和经济中心主任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2016 年的《马克思：伟大与幻像》主要关注的是马克思著作中“异常丰富的数据、官方报告和媒体报道”，结果是将马克思思想视为属于 19 世纪的过时和充满缺陷的产物，忽略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前提，而不是 19 世纪生活的实证记录。里德曼的这本传记则主要关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生平与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里德曼在书中反复强调马克思论著的未完成性。他在书中采纳了最近几年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海因里希和克里曼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再阅读等。

但麦克莱伦等人也指出了书中的不少错误，例如《资本论》的法文版虽然马克思本人也参与了修订，但主要的工作并不是马克思所做的，而是约瑟夫·罗伊（Joseph Roy）。该书也较少大量引证马克思本人的原话，所以有时让读者难以辨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想法，还是作者自己的理解。当然，瑕不掩瑜，该书总体而言是部原创性与启发都很强的传记作品。

就如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在 2018 年出版的《另一个马克思：早期的国际手稿》^②的书名所表示的那样，今日马克思并不是生活于 19 世纪的古董般的马克思，而是仍然在战斗的另一个马克思，是该书作者马斯托（Marcello Musto）另一本著作《今日马克思》所呈现出来的马克思。当然，今日马克思虽然所应对的实证对象已然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及其作

① Sven-Eric Liedman, *A World to Wi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Karl Marx*, Verso, London, 2018.

② Marcello Musto, *Another Marx: Early Manuscripts to the International*, Bloomsbury Academic, Year: 2018.

为实证主体的现实对象仍然没有改变，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找今日的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同样以马斯托的这一著作为例，该书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著为依据，对马克思关于后黑格尔哲学、劳动异化、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政治组织和革命理论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原著基础上的创新思考，由此描绘了有当代意义、令人耳目一新，却又忠实于原著的“另一个马克思”形象。

同样也如英国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埃斯（Gregory Claeys）撰写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①一书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不是古人，马克思主义一直富有生命力，从19世纪俄国革命延伸到当今时代，虽然偶有起伏，但从未过时。或者说，虽然曾经有一段时期，马克思的声誉随着苏东剧变而遭到败坏，但是随着近年来的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人们更是如饥似渴地努力重新理解和发现马克思以诊断并解答这个时代的问题，他特别提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努力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论著来获得启迪。这同样也意味着马克思并不是学院书斋中的学问，其一直始终和现实的人和普通百姓的命运密切相关。因此纪念也不限于学术与理论的纪念，就如鲁珀特·伍德芬和漫画家奥斯卡·萨拉特合作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图画指南》^②一版再版所表明的那样，非学院理论家的大众同样渴望了解和阅读马克思。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从理论上了解马克思，他们试图通过马克思及其家人的生活去了解马克思不为人知的品性与真实的生活，从中发现其思想变化的现实生活轨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由巴克爾（Jason Barker）撰写的以马克思生平为题材的传记小说《马克思归来》^③也于2018年出版，作者试图还原出活生生的、现实的马克思与其夫人的生活场景。另外，我们知道，由卡普（Yvonne Kapp）撰写的马克思小女儿的传记《艾琳娜·马克思》^④在今年也大卖，该书用900页的篇幅全面地呈现其如何在父亲的影响下，从一个柔弱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知识分子，并领导英国工人开创新工会主义的历程，与此同时，也从另一个视角对伦敦时期的马克思家庭生活进行了翔实

① Gregory Claeys, *Marx and Marxism*, Bold Type Books, 2018.

② Rupert Woodfin, *Marxism: A Graphic Guide*, Icon Books Ltd.

③ Jason Barker, *Marx Returns*, Zero Books; Reprint, 2018.

④ Yvonne Kapp, *Eleanor Marx*, Verso, 2004.

的展示。

卡弗 (Terrell Carver) 的《马克思》^① 一书, 卡弗在书中先是点评了数十种马克思的传记, 对于卡弗而言, 了解马克思最为重要的文本是《1844 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于马克思一生中真正出版实质性著作, 卡弗认为《资本论》的德文第 1 版和后面的版本, 以及各翻译版之间有不小的出入, 但基本上都是马克思在世时修订发表的。这也表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开放的, 这也如卡弗本人所主张的那样, 在政治实践中不断调整理论与概念范畴。因此, 卡弗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阶级斗争与阶级的妥协、历史与进步、民主与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革命、剥削与异化。对卡弗来说, 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统一的或断裂的、封闭和一成不变的马克思, 因为马克思本人一直在持续进行着艰苦的思想与理论斗争, 而且这样的斗争又是和政治实践, 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的。但卡弗也不无遗憾地指出, 今日的诸多政治行动都不再关心异化等哲学问题, 而只关心财富的分配, 从而一直被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所吸纳。

(二) 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 英国马克思主义活动已经不再仅限于学术讨论, 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大众性的普及活动

例如, 2018 年 5 月大英图书馆就隆重主办了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并通过借阅数据表明,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论著借阅量都日益增加, 同样, 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论著的馆藏量也日益增加, 在全球资本主义日益动荡和危机四伏的时代, 马克思思想比任何时候都对大众显示出了巨大的吸引力, 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乐于承认, 马克思是解决资本主义文明困境, 为新文明类型提供了丰厚思想指引的伟大思想家。

具体说来,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欧洲极右翼的兴起、英国脱欧的到来、中东权威国家的蔓延, 土耳其强人政治的加剧, 似乎蔓延全球的极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难以避免的了。但左翼对此的反思与应对似乎跟不上节奏。为了及时做出应对, 《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2018 年的主题被确定为“与右翼较量”。在会议的组织者看来, “9·11”后, 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极右翼的政治就日益与殖民的观念结合和巩固起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和财政紧缩政策的到来也日益鼓励了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

^① Terrell Carver, *Marx*, Polity, Cambridge, 2018.

起，他们聚集起来对于传统政治中的人权与平等观念进行了指责与批评，并通过提升本土主义来反对少数族裔，法西斯主义的萌芽已经在德国、意大利和像波兰、匈牙利这样的中欧国家出现，国际霸权对于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区的介入所产生的大量难民又日益成为西方社会弊病的替罪羊，种种纳粹主义的思潮并借助传统的言论自由得以广泛传播。因此，会议的组织者认为，有必要重思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能够为当下的境况提供思想支持与指导，我们又如何能重思激进左翼的条件以避免宗派主义的泛滥并真正动员一切被压迫的力量以完成反资本主义的大业？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们将2018年的主题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新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和代议制危机的关系”；“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与新自由资本主义、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关系与矛盾”；“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别在抵制和缓和极右翼中的历史与当代地位”；“帝国主义的变化形式，以及其与资本主义危机、剥夺、原始积累和全球种族界限的关系”等，不一而足。

另外，2018年5月5日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召开的“马克思200”纪念大会，有来自英国、德国、中国、古巴、印度和南非等国的多位学者参加，该会议是由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主办。工党的影子财政大臣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这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出席了“马克思200”大会，并作了题为“迈入21世纪：作为当代变革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讲话。此外，中国社科院马研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罗文东也受邀作了一篇关于国家权力的报告。

二、《资本论》再解读

应该说，马克思从未认为自己的毕生之作《资本论》是一本经济学的著作，如果一定要说他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著作的话，这本著作的根本特性在于毋宁说它是一本展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内在缺陷的伟大著作，或者是一本通过“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的方法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内部的缺陷和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伟大著作。

马蒂克（Paul Mattick）在《作为批判的理论：研究〈资本论〉的论文集》^①

① Paul Mattick, *Theory as Critique: Essays on Capital*, Brill, Boston, 2018.

一书中指出，在当代国外关于《资本论》的新解读中，如果说德国是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英国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的话，英美还有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派，那就是社会形式学派，除了马蒂克本人之外，还有穆里（Patrick Murray）、史密斯（Tony Smith）和普殊同（Moishe Postone）等理论家。和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开放马克思主义、新辩证法学派一样，他们都试图将马克思从李嘉图的遗产中分离出来，而不是将马克思视为李嘉图的 2.0 版本。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全新路径的开启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为坚定的批判者。此外，马蒂克等人认为不能像恩格斯那样，从历史主义发展路径来理解马克思，而应该从社会形式及其变革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虽然该书的一些论文以前发表过，但此次发表前重新作了修订，马蒂克在书中主要讨论了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价值的劳动理论过时了吗？第三卷和第一卷矛盾吗？转化问题，等等。在马蒂克看来，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不能用数字和数学模型来检测，因为就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而言，其是一个开放和可变化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实验室。因此，和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及克里曼（Andrew Kliman）不同，作者在原则上并不认同数字经济和经济机构提供模型可以用来检测马克思的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科学性在于马克思是从抽象性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即从资本主义的几个支柱性结构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自我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逻辑，简而言之，马克思是从形式的有效性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的。

对于作者来说，马克思方法论的主要文本是《大纲》和《资本论》的导言。而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方法论的继承，主要是用其来分析已有的历史结果，特别是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模型，至于其是否会成为世界的唯一模型，或者是否会被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并不是马克思《资本论》主要讨论的内容。

但和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关注的是社会形式的变革，而不是范畴自身的运动，在马蒂克看来，黑格尔关注的是“连续、有规律的理念的神秘联结……范畴的自我发展”^①。然而马克思致力用革命和政治的方式超越构成范畴运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结构。因此，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和

① Paul Mattick, *Marx's Dialectic*[J] //F.Moseley (ed.)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examination*[C]. Humanities Press, New Jersey, 1993:131-132.

历史目的论是非常不同的，后者是保守和肯定式的，而马克思是激进与否定式的。马克思只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范畴运动的规律时“卖弄起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因此，《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第三卷不过是第一卷的具体化，规定的多重化。

戴尔海姆和沃尔夫在《马克思的未完成体系：对作为时代挑战的〈资本论〉的批判性阅读》^①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卢森堡国际研究”系列丛书的一本。该书侧重于《资本论》第三卷未完成对今日的理论及政治工作所带来的挑战，戴尔海姆和沃尔夫认为《资本论》第三卷如果离开恩格斯的工作是不可能出版的。他们列举了五个方面的理由，其中比较重要的理由是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所期待的热切讨论并没有到来，整个理论界的静默让马克思很失望，当然还有健康问题等。

另外，对于转型问题，贝洛非奥里等人认为是个虚假的问题，原因在于新李嘉图学派未能很好地确认价值的货币形式、动态竞争及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内部所存在的对抗，即活劳动的具体述行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莫斯利（Fred Moseley）在《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一文中，在他2016年出版的论著《货币与总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马克思理论中“抽象性的两个主要层次”：一是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二是在第三卷中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并进而分析了包含于商业资本、利息和租金的分配等诸多的具体领域。

值得关注的还有，由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前所长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秘书长、德国学者胡贝曼（Gerald Hubmann）共同主编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个未完成的计划？》^②。这本文集的出版使得马克思构思《资本论》的思考过程，以及《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校改动细节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现。

柯林斯（Harry Collins）《人工智能：反对人类向计算机屈服》^③一书，认为

① Judith Dellheim and Frieder Otto Wolf (ed),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Karl Marx: Critically Reading Capital as a Challenge for our Times*, Palgrave Macmillan, Switzerland, 2018.

② Marcel van der Linden and Gerald Hubmann (eds), *Marx's Capital: An Unfinishable Project?* Brill, Leiden and Boston, 2018.

③ Harry Colli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ainst Humanity's Surrender to Computers*, Polity Books, Cambridge, 2018.

人工智能的最近发展，进一步激化了智力与体力劳动关系的争论。在持续的劳动过程的讨论中，哈里·布雷弗曼 1974 年开创之作《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以及雷特尔 1978 年的《智力与体力劳动》就已然讨论过知识与技术对劳动的宰制情况，而今的人工智能更是成了资本积累的主要运用和依托的形式。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学界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于智力和体力劳动的研究而言意味着什么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例如，如果说智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意味着同一阶级内对抗的加强，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仍然意味着对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不再有效？人工智能本身是否就能生产剩余价值？柯林斯看来，新观念、新思想的创造性的工作变成了当今体力劳动的一种新形式。因此，今日剩余劳动的产生之地，已不再是生产场所，而是实验室与科研中心。

智能机械人的最新运用不仅威胁到熟练工人的职业，甚至也包括雇主本身。因此，新的阶级斗争似乎变成了人与机械之间的斗争，即似乎在于我们如何能够避免成为愚蠢计算机的奴隶，作者认为这并非危言耸听，例如，计算机讲语言的能力甚至已经超过了本土的言说者。但柯林斯认为，人工智能最为缺乏的，一是马克思关于蜜蜂与工程师的讨论中所涉及的想象力，二是计算机缺乏身体，这使得计算机无法真正处理不确定的状况，特别是缺乏对错误的修复能力。

对于人工智能对劳动岗位的挑战，柯林斯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因为当代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是，人类真正的身份认同并非种族和意识，而是一份好工作，它丰富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公民。而人工智能在某种意义上反而能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标。其实，很多评论家已经指出，柯林斯著作的最大问题是非政治性，即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规训劳动者，种族、性别之间，又如何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到来而形成新的权力关系网络。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分歧与统一

阿斯图普洛斯等人所编著的《21 世纪反资本：激进潜流的读本》是一本有关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政治读本，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在社会的意义上想象一种非等级制和非剥削的真正独立自主个体关系的社会似乎是一场糟糕的乌托邦设想。但矛盾之处在于，作为当代社会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却持续将日

益加深的剥削关系与形式强加于当代黎民的身上，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繁荣、福利和自由反倒成了任何一种劳动关系的遮蔽。鉴于此，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克服就不只是对雇佣劳动者有意义，而且对于整体人性的恢复都是意义无穷的。

该书的“理论与实践”版块主要包含了霍洛威（John Holloway）的《思考希望、思考危机》，瓜塔里的《自由的新空间》等论著。而在“阶级构成与等级”板块，詹姆斯（Selma James）的《世界的无工资化》质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只关注工资劳动被剥削的教条，在他看来，今日的情况比较特别的是越来越多被资本排斥在价值生产过程之外的日益增多的人口，即马克思所揭示的产业后备军已日趋扩大。此外，作为价值批判学派的一员，他主张对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面把握来说，就不但要反对榨取剩余价值，而且要废除价值本身的必要性，因为价值生产赋予了劳动一种抽象的属性，即纯粹的货币属性，这一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超越了物与劳动的有用性或审美性，从而导致一种片面和同一化的思维产生。

亚普的《墙上的书写：论资本主义的解构及其批判》^①一书最近被译成了英文，他和其他的价值批判学派的学者一样，试图通过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与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以社会批判的方式复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总起来说，价值批判学派将自身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解放运动区别开来。对他们而言，劳动并不是马克思的起点，也不是终点。他早在1993年的《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再诠释》中就明确指出，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为独特的存在，其通过本质与表象的双重路径表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核之一，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其中一个面向是通过劳动来调节的。在作者看来，不管是德国的新马克思主义阅读学派、英国的新辩证法学派还是美国的社会形式学派，都可被归纳为奥义（esoteric）派的马克思主义，其与世俗化（exoteric）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工人解放运动不同，因为世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自身的调节器与自我修正。奥义派的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视商品形式、抽象劳动、价值形式与货币等问题。

^① Anselm Jappe,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Capitalism and its Critiques*, Translated by Alastair Hemmens, Zero Books, London, 2017.

对于奥义派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价值概念并非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也不是劳动的中性表征，并不是物之有用性或美等构成价值，价值是无内容的量的规定性，其主宰着个体的生命活动，使之单一化与片面化。价值的自主化与经济的合理化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并逐步从“商品—货币—商品”的循环转换为“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系统，所有的人与物都从目的变成了工具，将一定量的货币转变为更多的货币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的恶”。因此，价值批判的对象并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不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其试图寻找的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概念的根本性断裂 (categorical break)。因此其主旨并非是通过工会、左翼的民主政党或者民族解放运动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左翼组织，因此不可能与其自身的存在形式发生根本性的断裂。

因此，在价值批判学派看来，价值并非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定方面，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先验的形式，其是现代人际交往的普遍的中介和综合原则。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有超历史的规定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说经济的优先性反过来是一种现代现象的拜物教确认，因此价值概念是应该被定义为总体的社会形式。价值因此就不再是传统马克思所光荣宣称的劳动者是其创造者和来源，而成了一个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存在，如果资本成功将一切形塑为价值的话，这样的成功同样意味着摧毁。因此，价值批判学派旨在揭示价值的黑暗一面和被遮蔽了的面孔。在价值生产体系日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多余人 (superfluous) 的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功利主义和价值增殖的视角中日益成为无用之弃物的今天，价值批判学说需要得到正视和重视。

总之，虽然价值批判学派同样将自身的理论称为就其根本而言仍然是危机的理论，但这里的危机已然不再仅仅是经济的危机，而是人类生存的危机，放任资本主义内在逻辑自行发展的结果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而是人类否定性的毁灭。因此，资本主义的螺旋运动并不是向上的和带来美好生活的螺旋，而是“减记恶性循环” (Downward Spiral)，最为典型的是其将人类的一切才智都卷入了价值生产的运动，使得生态灾难变成了价值生产的手段，摧毁了人类文化的一切符号与精神基础。因此，庸俗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总是盲目地相信资本主义的生产性发展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未趋势和目的论的进步。然而，价值批判学派却从危机的视角指出，这种目的论是片面和否定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最终结果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是崩溃与毁灭，这是由

其内部的破坏性逻辑与内在矛盾所注定了的。就这一点而言，资本对自身的限度与损害比对其敌人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不只是对于人类的拯救，也在某种意义上是防止资本主义文明走向自我毁灭的唯一可能性。

在他们看来，劳资之间的对抗已经被铆钉在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内部，其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对抗，不可能从劳工身上找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批判的希望。他们的目标不是劳动的解放，而是从价值生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因此亚普对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及其抵抗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其仍然是一种经验和直接存在的抵抗。

因此，对于亚普等人来说，虽然“政治优先”这一卡尔·施米特最为喜欢的观念改为当代激进左翼“回归政治”的宣言，并将之作为市场的另一极对抗和反对资本主义。但其结果往往成为资本主义的左翼并最终支持着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在作者看来，建立在市场 and 普遍竞争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缺乏国家来维护其基本结构的话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在最为狭隘的意义上说，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政治都是非政治的，但从最为广义的视角来看，夺取国家政权却不改变商品经济的基本结构则同样是非政治的。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左翼政治运动的目标都是商品体系内部的再分配，而恰恰是商品体系本身所允许的冲突与对抗，其是在拜物教和无意识的商品体系之内的第二顺序调节机制。而对于“价值批判”的学者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包含着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与批判。即价值、货币、商品与劳动不是中性和超历史的永恒存在，其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否定性的内核，即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阶级、利润和剩余价值。对于价值批判学派来说，重新将经济置于社会的内部，或者普遍的社会民主是既不可能，又不可欲的。

总体来说，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精神宣言所说的那样，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抱有希望的人们，希望才将重新降临此世。《历史哲学论纲》补遗中，本雅明曾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和发展，或者说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火车头”。恰好相反，批判和革命是去启动紧急刹车的一场艰苦努力。

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一直没有停顿过，英国文化评论家、《卫报》(The Guardian) 资深专栏作家 S. 杰弗里斯 (Stuart Jeffries) 的《深渊大酒店：法兰

克福学派发展历程》^①一书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历程的回顾，展示了作者对何谓批判、如何批判进行的思考。该书用“深渊大酒店”当作书名，主要是借用卢卡奇的说法，卢卡奇把批判理论描绘成一个富丽堂皇、设备齐全、处在深渊的饭店，这个大酒店的客人每日在精美的膳食或风雅的娱乐之中注视并讨论着资本主义的灾难与深渊。“叔本华是‘深渊大酒店’的第一位客人。”他本人就仿佛每天从窗台往下注视着一片资本主义摇摇欲坠的“深渊”却不采取任何行动。

就思想史来说，该书比较完备地讨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思想进程，但对于批判何以可能，如何批判的问题，在这本长达400页的著作中仍然没有给出任何中肯的答案，不过其对于《否定辩证法》和《启蒙辩证法》的介绍是极其清晰又要言不烦的。对于弗洛姆与马尔库塞之间的关系亦处理得精彩适度，而最为让人爱不释手的是对于本雅明思想，特别是其美学思想的讨论与处理。另外，该书也提供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从而成为马丁·杰伊1973年的《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研究所史》，以及托马斯·惠特兰2009年《流放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思想史补充。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凯莉（Mark G. E. Kelly）在《保卫福柯：反对规范政治理论》^②一书中，针对规范政治理论日益流行的态势，认为今天非常有必要强调来自福柯的非规范政治的重要性。在凯莉看来，“规范性”理论往往将自身的理论置于“规范”（prescription）和应当的二元对立之中，因此，其往往通过观念的方式来引导政治行动的去向。作者并不完全直接拒斥政治哲学的规范性转向，但作者认为目前的规范政治仍然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伦理转向的阴影之下，从而限制了其他思考方式的可能性，而这需要我们将隐藏伦理道德政治背后的权力斗争逻辑显现出来。

凯莉指出，当主张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规范性理论的时候，是指我们不应该根据自由主义和分析哲学的范式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因此我们不能从道德规范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尽管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包含一定程度上的规范性倾向，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① Stuart Jeffries, *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2017.

② Mark G E Kelly, *For Foucault: Against Normative Political Theory*, SUNY Press, Albany, 2017.

思想就本质而言是非规范的，而是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结合。总之，马克思从来没有从道德的角度谴责过资本主义，而是将资本主义体系作为对象来分析和研究。其次，作者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唯物主义而非观念论的立场，提供了反规范主义倾向。因此，即使是1847年后马克思仍然使用一些如剥削、盗窃、抢夺、奴役等明显带有道德谴责意味的规范性术语，其也只是偶尔情绪式的表述罢了。换言之，马克思从来没有通过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来完成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构。

四、种族、不平衡与综合发展

汉查德 (Michael George Hanchard) 的《种族的幽灵：歧视是如何萦绕西方民主的》^① 一书，以及巴特查里亚 (Gargi Bhattacharyya) 的《重思种族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与幸存者》^② 共同得出的结论，有如《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所说的那样，“西方的民主正在衰退”，民主与资本主义似乎是天生一对的印象，在当今和未来的时代可能将被改写，以自由著称的西方世界也将逐步改写其色彩。对于民主一词来说，多数人的印象是民治 (rule by the people) 的表达，但人民概念自始以来就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在西方主要表现为种族的排斥。汉查德通过政治史的梳理，表明不平等并不是民主要消灭的现象，恰恰相反，其是民主政治的结果，因为民主的前提是“人民”，因此，伴随西方民主的一直是奴隶制与帝国主义。巴特查里亚在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倾向是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造成去人性化的劳动，而种族化的差异原则则能被用来保卫这个趋势。即由特定的人群来承担这一不幸的趋势。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关于〈西方如何走向统治〉的争论》^③ 一文中，华普利指出，阿涅瓦斯和尼三休鸠的《西方如何走向统治》在2015年出版后引起了诸多的争论，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以其为主题主办了一期

① Michael George Hanchard, *The Spectre of Race: How Discrimination Haunts Western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2018.

② Gargi Bhattacharyya, *Rethinking Racial Capitalism: Questions of Reproduction and Survival*,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Lanham, MD, 2018.

③ Adam Fabry, *The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of Global Capitalism: Debating How the West Came to Rul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6 (3).

专题讨论会。这一主题涉及资本主义起源的时间与空间这一学界持续争论的重大问题，其不但涉及经济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等主流学科的定性，还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的领域，这一话题曾经争论了几十年而没有共识，随着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紧缩浪潮、仇外主义、强制性国家的实践，都促使这一问题重新回到学术界的视野。资本主义史甚至开始在哈佛等高校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幽灵仍然是困扰学术界的重大问题，学术界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

例如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在 2011 年的《西方文明与其余世界》中，概括了西方文明所谓的六大主要优势，即竞争、科学革命、财产权、现代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在他看来，财产权是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础。吉丁和帕尼奇则在 2013 年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帝国的政治经济》中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其与美帝国的关系。而阿涅瓦斯等人的《西方如何走向统治》则通过借鉴托洛茨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挑战了资本主义起源的西方中心论倾向。

在华普利看来，该书直接挑战了资本主义起源的主流观点，即亚当·斯密和 M. 韦伯的欧洲中心论及方法论的内在主义 (methodological internalism)，而该书认为其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众所周知，M. 韦伯是通过特定的政治结构、理性的自我利益、竞争与自由市场，以及独特的文化理性形式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并赞赏其辛勤工作的道德价值。主流的社会科学将这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解释视为西北欧独特的发展过程，并且其将被所有非欧洲的、想要变成发达社会的社会所复制。阿涅瓦斯等人认为这种欧洲中心论与线性的人类发展观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似乎已经被证实。不过，遗憾的是其不但成为资本主义起源的标准说法，还不幸地被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信服，从最为的“过渡争论”到最近受世界体系理论和政治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诸多论著来看，皆是如此。

针对这一背景，阿涅瓦斯等人准备建构资本主义起源的全球史，而不是地方史，并且是与主流学界的欧洲中心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市场扩张主义的“外在论” (externalist)，以及强调社会财产关系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论” (internalist) 传统根本不同的路径。如前所述，他们主要吸收了目前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研究和历史社会学领域得到一定复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不平衡用来指称更为一般

的在体量、文化和社会政治组织、物质与非物质生产等领域存在着的多种类型的人类史规律，其是多尺度的概念，辩证地和国际结构与地缘政治纠缠在一起。

通过这一理论，托洛茨基强调后发国家的优势地位，即在批判传统生产方式的时候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最终完成双重批判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需要同时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阿涅瓦斯在考察了全球而非仅仅是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后提出了超越欧洲的资本主义起源论，以及镇压、剥夺和民族间的种族压迫等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密切关系。从这点来看，似乎阿涅瓦斯等人更为接近世界体系理论的外在论，而不是强调社会财产关系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论。

参与讨论的其他学者对阿涅瓦斯等人的思想路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例如巴纳吉 (Jairus Banaji)、戴维森 (Neil Davidson)、迪莫克 (Spencer Dimmock)、米德维 (Mladen Medved) 等人在承认该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上的重要贡献，即从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因素来考量，并且发现欧洲直到 16 世纪时期，仍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处于落后状况的事实。不过，迪莫克等人还是认为布伦纳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于内在的社会关系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但同时也强调了西欧资本主义对奴隶和其他社会形态的外在剥夺对于形成欧洲的优势地位是极有用处的。与之不同，戴维森指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只适合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而不能运用于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并用之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巴纳吉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商业资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阿明 2018 年的《现代帝国主义、垄断金融资本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①一书，汇集阿明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思考，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帝国主义语境中的价值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该书是这位伟大学者的一部重大遗著。阿明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不平等发展》等论著中，就通过运用保罗·巴兰 (Paul Baran) 和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 的经济剩余理论，指出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但也必须与时俱进，更新到价值形式的全球化时代，阿明因此在马克思的“价

① Samir Amin, *Modern Imperialism, Monopoly Finance Capital, and Marx's Law of Value*,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18.

值规律”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化价值规律”，即价值生产已经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事，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规模，全球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控制着生产和分配。

对于阿明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基于价值形式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尽管有基于竞争的全球价值规律，但是同样存在基于中心与边缘结构的不平等交换。因此，商品的价值生产对于阿明来说是南北半球一致的，其受规定性的全球价格的影响，但问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的价值生产结构，也就是对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形成了不平等的交换结构。即使其带动边缘国家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剩余价值被发达国家掠走，其无法真正完成将经济剩余再投资的闭环，因此就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从而必须接受帝国主义国家所书写的贸易合同。

另外，对于工资和劳动力价值来说，阿明认为虽然劳动力价值存在一个全球的基准线，但发展中国家同等劳动力价值的工人获得的工资远低于发达国家，从而，全球南北国家存在的严重同工不同酬，形成了帝国主义的租金与超级剥削结构。在阿明看来，全球的劳动者应该联合起来相互帮助，因此他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第三世界理论，也反对与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做法。《现代帝国主义、垄断金融资本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了解阿明的思想和当代帝国主义的动态结构，全球资本积累和被压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五、国家主权与激进政治

可以说，苏东剧变以后，资本主义曾被普遍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结样态，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与政治斗争也往往被限制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但新世纪以来，曾被认为终结了历史的资本主义被终结日益成为左翼激进思想家思考的主题。他们或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批判或价值形式批判的视角出发，思考不受抽象劳动的价值生产，或者价值形式的货币捕获生命解放如何可能。或从资本逻辑的瓦解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思考社会主义的未来。或从信仰、精神与宗教的视角，讨论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对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路径是以伊格尔顿为首的宗教政治转向，在

2018年的《激进的牺牲》^①一书中，伊格尔顿从宗教和神学视角理解当代激进政治的路径，尽管他的立场是非宗教和神学的。在该书中，牺牲被界定为具有独特含义的哲学和政治概念，其不再是反启蒙的反动宗教所鼓吹的宗教牺牲，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本身进行否定与挑战的政治行动。因为对于世俗界或者自由主义的想象中，牺牲是一种惩罚或缺损，或者是一种死亡与消失。但在伊格尔顿看来，在激进政治的视野中，牺牲恰恰是一种新生，一种脱胎换骨的生命转换，而不是拜物教所造成的毁坏与死亡，因此牺牲是一种复归(rehabilitation)。

伊格尔顿具体通过“悲剧与苦难”、“殉难与道德”、“交换与额余”、“国王与乞丐”等诸多他长期思考的主题来展开，除了与当代的诸多激进学者对话外，伊格尔顿动用最多的思想资源是弗洛伊德的爱欲与死本能的思想。应该说，伊格尔顿与阿甘本等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试图将牺牲理解为一种纯粹神学与信仰的事件，而不是能和世俗世界相结合的一种激进政治。和《理性、信仰与革命》、《论邪恶》等著作一样，伊格尔顿在该书中同样希望能借助其他思想资源来重新诠释马克思。在他看来，就像俗人将犹太和基督教理解为一种偏见、迷信和病态一样，俗人也往往将社会主义简单等同于“古拉格”。伊格尔顿的结论是，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其肯定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俗人。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对于伊格尔顿来说，重点在于如何思考对后期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转换。和巴迪欧等人求助于纯粹的事件与断裂不同，伊格尔顿求助于神学与宗教资源，在他看来，神学与宗教虽然如马克思所说具有“人民的鸦片”的特性，但是对于后期资本主义这一完全无信仰、无灵魂、无心的世界来说，神学与宗教的资源能帮助人们与之形成断裂。

不过，许多学者指出，伊格尔顿在借用神学思想资源方面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记了神学与宗教神秘化和模糊真实的统治方面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每周日前往教堂进行祷告的人们根本不可能如伊格尔顿所设想的那样会想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实践，能产生激进革命实践的是那些经验着异化和剥削的人们，而不是教堂里做礼拜的信徒。现代资本主义的革命意义恰恰在于用世俗化的自由、平等思想颠覆了传统宗教的等级制，因此对于神学的恢复只会带来反动而不是革命的后果。而对于巴迪欧的借鉴亦只能达到外在化的效

① Terry Eagleton, *Radical Sacrifi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8.

果，即“事件”仅仅是经验处境之外的存在，其代表的是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断裂而不是辩证的转换。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不但意味着可欲，更意味着可行。巴迪欧的无中生有（*ex nihilo*）这一概念虽然对于冲破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有意义，但却和资本体系本身的矛盾运动毫无关系，因此也就失去了唯物主义的现实条件。

虽然已发表了3年，但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莱布维茨（Michael A Lebowitz）关于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尤其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更是如此。他在《从歌达纲领到当下的社会主义绝对命令》^①一书中，指出了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却并非完全拒斥现代文明（如苏联模式）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主要由类似铁三角的三个支柱来构成：（1）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2）生产组织主要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资本家来完成；（3）最为重要的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的。应该说，第一和第二方面的特征，使得莱布维茨与同样强调再分配和平等正义的罗尔斯等新自由主义不同。

莱布维茨自认与罗尔斯的根本不同在于：罗尔斯关心的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而他本人更为关心的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后者要求有意识地终结资本主义，去改变和挫败资本逻辑，其要求改变人们将资本逻辑视为自我证明的自然法则的意识。但何以可能呢，作者引用了查维斯的演讲，表明新文明类型不应是苏联式的，也不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而应该是将人放置于比机械和国家更高的人道主义立场。作者认为这应该是21世纪社会主义立场，其不再追求生产资料的扩张或国家的导向，而是将人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如果说资本逻辑的社会里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价值增殖的话，在社会主义的逻辑里，恰恰相反，客体的社会财富主要用于满足劳动者自身发展的需要，即丰富个性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就是目的本身，联合起来使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不过，许多评论家也指出，由于没有政治和国家主权的考量，如何从资本逻辑的现代文明过渡到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的思考仍然是抽象和乌托邦的，而且其旨在通过工人自身的管理而无国家的教化与管理，也使得其可

^① Michael A Lebowitz, *The Socialist Imperative from Gotha to Now*,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NY, 2015.

行性大打折扣，其整个思路还是自由主义传统的将国家变成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将社会奠立于国家之上的思路。虽然作者也强调了一系列的社会组织机构的重要性，但如果没有了国家，社会的组织机构将是一种幻想，当莱布维茨试图给予国家最低的合法性，即所谓从下而上的类型时，这样的国家与霍布斯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国家又有何异？换言之，莱布维茨不明白，资本主义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主义的体系同样也依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试图将社会主义国家把握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的做法，恰恰误入了非主权政治的幻想之中。

对于这个问题，史密斯的《超越自由平等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与社会规范理论》^①认为，如果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政治解放面临贵族等反动力量威胁的话，今天的反动力量则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对于任何希望新自由主义在2007年的危机能够导向资本主义崩溃的人，今天无疑都会深感失望。因为结果是信贷货币的进一步加强以及更高的剥削率，普通百姓生活标准的日益下降，失业率日益高企。信贷奴隶是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最为根本的特征，失败国家也日益增多。面对这种境况，左翼的自由平等主义日益成为主流的学术话语和标准。但史密斯要追问的话，自由的平等主义或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例如自由、正义、权利、善等能否在21世纪提供足够的思想框架来解决这些危机与问题，还是说其只是丢掉了本质如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式的陈词滥调？

反过来，史密斯在该书中，特别是第八章中明确拒绝了各种经济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并且质疑认为马克思除了工具主义或功能主义的国家外，没有在政治本体论的意义上讨论过国家的核心作用。在他看来，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首先至少在功能上为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教育、财产权的执行，等等。其次，国家是整个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方式内部政治斗争调节或完成的中介，例如自由民的摧毁与劳动时间的延长与缩短等，无论从马克思的什么文本中，我们都无法明确得出国家政策是根本被决定的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更为倾向性的结论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与互为因果性，例如《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八部分，马克思就集中论述了国家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史上的核心与关键作

^① Tony Smith, *Beyond Liberal Egalitarianism. Marx and Normative 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rill, 2018.

用，更别说《雾月十八日》和大量报刊文章中更为明确的论述，而在《资本论》的其他章节中，马克思则对国家对资本积累与剩余价值的关键性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而对于传统政治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讨论，史密斯认为对马克思而言，这不是自然和既定的，而是要将其批判性地理解为一种政治架构，并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榨取之间的分离亦表明了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本身同样是政治与经济的综合性概念。

总之，英国马克思主义仍然十分活跃，他们的思考虽然很多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但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探索方面，仍然十分值得重视。其提供的方法与方案，也仍然值得借鉴，其仍然是 21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哲学学院